



# 中日网

---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专题 > 南京大屠杀 > 论文

## 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初步研究

发布时间: 2010-08-15    点击次数: 561    作者: 张 生

**内容提要** 对于战争造成的“软性”,“隐性”伤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即引起关注,现在国际学术界用正式定义的PTSD加以概括。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营造的极度恐怖环境,是受害者PTSD广泛产生的客观环境。受害者的PTSD症候、表现为因惊恐而失去行动能力、精神失常陷于歇斯底里状态,失忆,情绪失控、自杀等。美国籍受害者魏特琳、虽曾企图通过宗教来拯救自己,但最终被PTSD击垮。初步研究表明,PTSD存在于涉及南京大屠杀的中外人群之中,其影响从当时延续到现在。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受害者 PTSD

在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过去主要集中于日军的杀人、强奸、抢劫、纵火等“显性”犯罪和暴力的研究。此后逐步有人延伸到受害者、特别是女性受害者的“心理创伤”研究,从而使我们关注到那些比较“隐性”的层面。

其实,在国际范围内,对于战争隐性伤害的关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开始。随着医学、心理学研究的进展,人们发现,隐性伤害甚至更为广泛和持久,而且不仅仅限于心理问题。就南京大屠杀而言,通过爬梳文献和幸存者调查,我们逐步发现了隐藏在宏大叙事和血泪控诉背后的冰山一角。由战争恐怖和暴力引发的目击者、幸存者和受害者的综合症状,已超出了过去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和理解。本文拟将PTSD研究引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从而实现运用跨学科方法重新审视那一段历史的目的。创新性研究,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 一 PTSD概念的引入

按照美国精神病协会1980年的定义,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中文译为“创伤后应激障碍”)通常由亲身经历或目睹的严重威胁和令人极度恐惧而又无助的暴力事件引起,当事人经常在脑海中浮现或在噩梦中经历当时的情况,并有严重的焦虑、失眠、情绪失控、抑郁、失忆等症状,严重者自杀倾向明显。就儿童而言,如果成年后再次受到伤害,就更易遭创伤后的压力摧残(Mine-ka& Zinbarg, 1996)。[1]PTSD患者中发生多种躯体症状是有其生物学基础的,已发现PTSD患者血清儿茶酚胺和甲状腺激素的水平升高, $\alpha 2$ -肾上腺能受体的活性增强,正电子放射体层扫描和磁共振显像的结果均显示,在PTSD患者的大脑中,有两个重要结构即扁桃体和海马区发生了功能性改变,而这些区域的功能结构均与恐怖反应有关。[2]

在国外,PTSD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医学文献检索系统(NCBI)收录了全世界14800余篇相关论文。其中,Karatzias T, Power K, Brown K, McGoldrick T • 讨论了PTSD中抑郁症的角色功能,W ilcox HC, Storr CL, Breslau N • 研究了都市青年PTSD患者的自杀尝试,Kubzansky LD, Koenen KC, Jones C, Eaton WW • 研究了PTSD对妇女心脏疾病影响,Moore SA • 研究了PTSD患者的认知反常,Giosan C, Malta L, Jayasinghe N, Spielman L, Difede J • 研究了“911事件”亲历者和废墟清理工人中PTSD患者的记忆矛盾现象,Thompson BL, Waltz J • 研究了PTSD患者的自怜,Klari M, Franciskovi T, Klari B, Kresi M, Grkovi J, Lisica ID, Stevanovi A • 研究了波黑妇女的PTSD综合症及社会支持,Dignam P • 研究了PTSD折磨下儿童的精神疾病。David G • Myers的《Psychology》在心理障碍范畴内讨论了PTSD的各种成因、表现,尤其关注了战争

漩涡中人们的PTSD及其干预方案,等等。可以看出,国外PTSD研究已经深入到多个不同的侧面,把PTSD对人们的“软性”、“隐性”伤害揭露了出来,并结合历史史实,展现了PTSD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广阔发展前景。

在中国,十多年前,医学界注意到国外PTSD研究,近几年开始自己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进展。王焕林等人研究了中国人中的PTSD[3],张本等人研究了唐山大地震中孤儿的PTSD[4],徐唯等人研究了特大爆炸事故中幸存者的PTSD[5],马磊等人研究了PTSD的遗传易感性危险因素[6],张克让等研究了SARS中患者和民众的PTSD[7],程灵芝等人研究了PTSD的干预和治疗[8],黄静等人研究了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PTSD[9],王瑶研究了被强奸女性的PTSD[10],杨晓云研究了大学生的PTSD[11],等等。相对而言,中国心理学界关于PTSD研究的著作不如医学界丰富,结合历史学研究的PTSD研究则付阙如。

战争会激发出某些人深藏于内心的黑暗和暴力,而无辜的经历者无力改变事实,这使得他们大范围地成为PTSD患者。以911事件为例,1个月后,8·5%的曼哈顿居民被诊断是受害者(Galea&others, 2002)。另据调查,世界贸易中心附近20%的居民反映出现恐惧、焦虑、广场综合症等病症。研究者认为,有约40万纽约人出现应激障碍(Susser& others, 2002)。另据研究,PTSD的患病比例,可以从经历自然灾害人群的4%,上升到经历绑架、俘虏、折磨和强奸人群的50% (Brewin&others, 2000;Brody, 2000;Kessler2000)。[12]

相比911事件后的纽约,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南京城市环境更加恐怖。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很长,高潮期达6个星期,施暴者日本军人与南京居民直接接触,枪声不断,大火旬日不熄,被害者尸体随处可见。而且,证据表明,日军以特别的方式进行加害,以“营造”恐怖气氛,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说:“看到遍地是女尸,有的阴道里戳着竹竿,人们会恶心得透不过气来。”[13]德国使馆驻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报告说:“我的英国同行、领事普里多——布龙,英国武官洛瓦特·弗雷泽和英国空军武官温·沃尔泽在察看英美烟草公司帕森斯先生的住宅时发现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位妇女的躯体。”[14]军医蒋公?在大屠杀期间躲藏于美国大使馆,他记述道:“最残酷的莫过于活埋了。悲惨的哀号,那人类生命中最后挣扎出来的一种尖锐的无望的呼声,抖散在波动的空气里,远在数里以外,我们犹可隐隐的听得。”[15]尤其可恶的是,日军在实施暴力犯罪时,常常故意强迫南京市民在一旁观看。罗森报告称:

“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家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同谋犯把受害者丈夫或父亲拘留,并迫使这些人充当他们败坏自己家庭名誉见证人的情况屡见不鲜。”[16]当时,藏身于意大利驻南京总领事馆的教导总队辎重营长郭歧记述道:

那一天,隔壁洋楼门外来了几十名鬼子兵,领章有黑有黄,但却既无部队番号,又无官长……先把大客厅里的男人统统撵走,再将半老徐娘们拉了过来,当着小孩子的面,光天化日,明目张胆,就在大客厅里,把半老徐娘们的衣裳剥得精光,然后集体演出丑剧,三对一,五对一,去而复来,周而复始……孩子们几回见过这种骇人的场面,一个个的全都吓哭了……客厅外,庭院里,那些女人们的丈夫们,一个个失魂落魄,面红耳赤。有人伏在墙上,哀哀的哭,有人双手抱头,木立不动……一个兽欲已达,裤带犹未系好的鬼子兵快步走出门来,上了大街,又遇见了一队鬼子兵,又是好几十名……这一批紧跟着又一哄而入……[17]

无休止的暴力,使南京居民饱受折磨,在PTSD的打击下,“人们觉得自己像个重病人,以恐惧的目光注视着时针走动,觉得它走得太慢了,一天好像有100个小时而不是24小时,没有谁知道自己何时会康复”。[18]中国人作为暴力犯罪对象觉得恐怖,处于中立地位的西方目击者同样如此。

1937年12月17日,日军闯入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号称要搜查中国士兵,负责管理该校的美国籍人士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计谋:把负责人困在前门,由三四个士兵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时间似乎凝固了,在恐中我们长时间没敢动。”[19]

恐怖的环境及其决定的南京居民的身心状况,使得PTSD成为当时南京的一种“常态”。

## 二 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诸症候

### (一)惊恐万状失去反应能力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疑问:那些受害者为何在灾难降临时呆若木鸡,无所行动? PTSD研究

告诉我们,患者在极度恐惧中失去反应能力是常见的情况。南京浦口村民黄学文是个“幸运”者,1937年12月15日,日军到他们村子,把几十人集中起来,从中找手上有老茧等可疑迹象者,共挑出5名男子。其中一个是个鬼子,被释放了;黄学文的父母和妻子抱住日军的大腿求饶,最后被释放;其余3人,因为是外乡“跑反”(方言:遇战乱到外乡避难)的,无人出面求情,均被枪杀。长期在乡间过着贫穷而简单生活的黄学文何曾见过杀人的场面?他遭遇的应激障碍甚至超出专家们的描述,“我当时被吓得眼发黑,什么都看不见,大白天就像晚上一样”,“只听到有

枪响”。黄学文有多少文化,他当然不知道何谓PTSD。虽然69年过去了,一说起日军,他只有“害怕”两个字。[20]因为极度惊恐,南京市民畏缩在一起,像待宰的羔羊。拉贝记录了他家附近一条巷子的惨状:“下水道里3天来也已塞满了好多具尸体。见此情况,人们不禁恶心地浑身颤抖。在院子里,许多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失措的双眼沉默地相互依偎在一起,一半是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他们不敢有所作为,只是希望拉贝这个“洋鬼子”能赶走日军。[21]因为失去反应能力,当时的南京市民,虽有反抗,但为数甚少。诚如拉贝所说:“中国人遭受了太多的凌辱,长时间以来已经习惯逆来顺受了。”“如果每起强奸案都能遭到致命的报复,那么相当一部分占领军早就被消灭了。”[22]

时间长了以后,南京市民对显而易见的危险表现得极为冷漠。如在拉贝家避难的南京居民“经历了日本士兵带来的苦难后,人们对空袭的危险已变得无动于衷了。成群结队的难民默默地站在院子里,眼睛望着飞机,有些人对飞机不屑一顾,而是从容不迫地在草屋里做他们的事”。[23]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德国、日本居民身上同样如此。[24]

更有甚者,长时间被暴力和恐惧震慑,有些南京市民失去了最起码的人格和自尊。1938年1月2日,日本妇女国防会的几个人到南京粉饰太平,魏特琳带领她们参观。据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说:“那三个女鬼走时拿出几个霉苹果和[一]点糖,那些中年难民围着要、抢着要;她们手上拿着几个铜板,就在她们手上抢,简直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完了。”[25]浑然忘记了难民营还随时在发生强奸、抢劫、屠杀,这就接近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了。

## (二)精神疲劳和失忆

乔治·菲奇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干事、安全区官员之一。1938年春,他携带约翰·马吉拍摄的记录电影返回美国向公众宣讲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时,经历了无以言状的失忆。“在演讲的中途,我的心成了一片空白。我想不起来自己在哪里?接下来要说什么?幸亏我想起来带来影片的事儿,我想如果把它放映的话,也许能讲一讲的。这总算顺利过去了,但是最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回到我妻子帕萨迪纳的公寓”。在另一次集会上,正在演讲的乔治·菲奇碰到了同样的事情,而且由于没带影片去,茫然失措的他只好“结结巴巴地讲到了结尾”。X光检查显示,他的脑部并无问题。因此,菲奇自我诊断说:“在南京的每天的可怕记忆也许同我这神经性疲劳有些关系。”[26]

问题,即如何回到我妻子帕萨迪纳的公寓”。在另一次集会上,正在演讲的乔治·菲奇碰到了同样的事情,而且由于没带影片去,茫然失措的他只好“结结巴巴地讲到了结尾”。X光检查显示,他的脑部并无问题。因此,菲奇自我诊断说:“在南京的每天的可怕记忆也许同我这神经性疲劳有些关系。”[26]

## (三)歇斯底里精神失常

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A·T·斯提尔是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之一,他报道了灾难降临时中国士兵的失常行为:

随着日军搜查网的收紧,有些士兵因为恐怖而精神失常了。我曾经看见一名士兵用蛮力抢来一辆自行车,鲁莽地朝着在前方数百码的地方前进的日本军队猛冲过去。在路上的行人告诉他这很危险之后,他又突然掉头向相反方向猛冲。他突然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撞到了一个市民身上。最后我看到他一边脱自己的军服,一边想去剥那个市民的衣服。有的士兵则骑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乱跑,对着天空胡乱开枪。留在市内的仅有的几个外国人之一、一个身强力壮的德国人决定教训他一下,就把那个男的从马上拉了下来,夺过他的手枪,朝他脸上打了一拳。那人叫也没叫一声,承受了这一拳。[27]

市民更加惊恐,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记录了日军的抢劫造成市民更加惊恐:“穷人的食物都被抢光了,他们处于歇斯底里的惊恐之中。”[28]德国驻华使馆南京办事处行政秘书沙尔芬贝格记录了另一个案:“可惜这支占领军又进行了轮换,用年轻的新兵替换全体老兵,遗憾的是仍然发生很多抢劫、强奸以及与此有关的谋杀事件。19号房子附近住着一位精神错乱的母亲,我们朝向边上的那扇窗子不能开,她总是大声哀嚎着:‘杨姑子,小孩子啊!’听了让人忍受不了。”[29]中国报纸也引用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载了“难民均患精神性的恐怖病”的事实。[30]

## (四)提起往事情绪激动失控

儿童期遭遇震撼性恐怖事件,更易形成PTSD,成年后的漫长岁月里,如再次被唤醒记忆,会反复遭受冲击。南京大屠杀性暴力受害者之一张秀红,被日军施暴时才12岁。下面不避繁冗,引述对她采访的过程

[证言]那年(1937年),我家住在南京的沙洲圩双闸那一带。为了躲避日本兵,父母带着妹妹逃走了,我和爷爷留下来了。日本兵烧了我家的房子,没办法,我和爷爷只好“跑反”,日夜住在田头,带了点米做饭,做好装到口袋里,饿了吃一点,听说日本兵到处杀人,也不敢回家。

[旁白]说到这里,老人悲从中来,第一次留下了酸楚的眼泪。

[证言]躲了10多天,爷爷就带我回家,看到周围全是尸体。日本兵到处抓女娃,没办法,好多女娃用锅底灰涂脸,

有的人家就把女娃藏在草堆里。日本兵来了,就用刺刀一一下地刺。有的女娃被刺伤,疼得受不了跑了出来,被日本兵追上抓住,扔到草堆上点火烧。好多女娃被烧死,那个惨啊!

更多女娃被家人藏到芦苇荡里,我也被藏了进去。我看了一下,那里面有四五十个女娃。一开始,日本兵没发现,几天后就被发觉了。可恶的日本兵点起了火,女娃们一片哭喊,我和另外两个跳水后逃生,那是冬天,水里冰冷!那个惨啊,那些女娃都被烧死了。

[旁白]老人再一次泣不成声,泪水打湿了脸庞。旁边的日文女翻译也哽咽了。

“我要是不去,我和爷爷都会死”

[证言]我又逃回家,跟爷爷在一起。很快又来了几个日本兵,要把我拖走,说要“塞乎,塞乎”。爷爷央求他们,孩子太小了,不要伤害她。日本兵不听,用刺刀戳得爷爷直冒血……我也哭,跪下来对爷爷说,我要是不去,我们两个都要死,我一个人死不要紧,但我不能让你和我一起死啊……接着,我被他们拖到隔壁一家的床上……我疼得昏死过去,后来日本兵走了,爷爷赶来抱住我哭:“红子,是你救了我啊!你受苦了!”

那时没医没药,爷爷只好用绳子把我的双腿捆紧,帮助我的伤口愈合。可没多久,日本兵又来了。为了爷爷,我真的是没办法啊。

[旁白]这是老人一生中最痛楚的经历,那年她才12岁!说到这里时,满脸泪流的老人忽然头向后一仰,双臂张开,悲恸欲绝……

挑漂亮的女娃拉走“塞乎,塞乎”

[证言]后来,有邻居出主意,让我把头发剃了,变成男孩的样子……剃头后,我常坐在门口,亲眼看到日本兵拉来几十个女孩子,弄来一盆盆水,逼着女娃们一个个洗去脸上的锅底灰和泥灰。然后挑漂亮的拉走,“塞乎,塞乎”,不从就用刺刀刺,硬拖走,也有的被杀掉;那些不漂亮的,被日本兵用机枪“嗒嗒嗒”地杀死了。这样的我看到了好几回啊!好多女娃都是这个样子死掉的。

大人遭罪,小孩也受气,我亲眼看到日本兵抱起一个小孩,也就这么大(从她现场比量来看,小孩不到2尺高,应是一个婴儿),挑在枪尖上玩,小孩疼得哇哇大哭,那帮畜牲却说他是在笑。

[旁白]老人再一次泣不成声。翻译也停了下来,帮她拭去泪水。“那些鬼子真不是人啊!我恨死他们了!”从老人用尽力气说出的这句话中,在座的每个人深深地感受到了老人那份刻骨铭心的痛楚。

“我生儿子,三天三夜才生下来,那个苦啊”

[证言]我剃了男孩头以后没有多久,就被日本兵抓去干活,抬土,抬水,抬石头。我是个女的,才12岁啊。我抬不动,日本兵就拿着枪从后面刺我,用枪托打我。我左边这条腿上面,直到今天还疼。

我侥幸活了下来。可日本兵给我们留下的伤害太大了。我生儿子时,生了三天三夜才生下来,那个真是苦啊。以后想要孩子也不能生了。

[旁白]日本兵给一个12岁的女孩造成的痛苦是一辈子的。记者注意到,老人报告结束时,几乎站不起来。据陪老人一起来的儿媳蒋金兰介绍,婆婆活到今天不容易,日本鬼子的伤害使她常年子宫下垂,每到阴天就疼痛难忍,至今如此。左腿和胯骨也因为鬼子伤害,坐站时间稍长就酸疼。[31]

### (五)自杀

自杀是PTSD打击下个体的极端反应。研究表明,自杀者在事前通常会给亲人、朋友一些暗示,或者公开讨论过自杀,或者把财产转移给别人。长期悲观的人,自杀的概率是常人的5倍,自杀不完全出于反抗或报复,相反,往往是结束无法忍受的痛苦的一种方式(Bostwick& Pankratz,2000)。

在南京汤山一带工作的福音传教士卢小庭在日军到来之前就很悲观,日军占领南京后,“他显示了良好的助人及无私的精神品质”,但他显然无力从PTSD中自拔,在与美国牧师福斯特和马吉谈话中,表达了以死来抗争黑暗社会的想法。福斯特奉劝他:基督教的观点是活着而不是死去。但是,1937年12月31日一早,他出了门,留给福斯特一张便条、一首小诗和他的钱包。他在留言中说:上帝不会把他的自杀视为罪过。[32]

这不是个案,遭受凌辱的妇女,更加容易选择自杀结束痛苦。美国传教士马吉的纪录电影中,一个被抓住充当日军“慰安妇”的15岁姑娘证明了这一点:“她认识的一个同时从芜湖抓来的女孩子自杀了,她还听说其他人也有自杀的。”[33]

### 三 魏特琳个案

如前文所引事例,PTSD症候并不仅仅出现在日军直接暴力受害者身上。实际上,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人,同样会遭受折磨,并引发严重后果。这就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范围。魏特琳的病因要溯及南京大屠杀发生前10年的“南京事件”。1938年3月24日,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的脑海中往事历历在目,我不时地想起11年前的这一天发生的事!当时,我们高兴地迎来了新的一天,有消息说,北方军队正在悄悄地撤退,革命军队已经进城了;接着传来了威廉(W illiam)[34]博士不幸遇难的悲惨消息和新军强烈的排外情绪,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在附近的山上出现了令人恐惧的黑影;我们撤退到金陵大学里。那天晚上大约这个时候,我和约翰·赖斯纳(John Reisner)向外看着这个城市,黑暗中只看到焚烧外国建筑物的火焰。[35]

这样的回忆在魏特琳日记中周期性出现,如1939年3月24日的日记也记录了同样的内容。这说明魏特琳早在1927年就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不过,1927到1937年10年的和平生活使其创伤大为平复。南京大屠杀发生后,魏特琳受到更为严重的创伤,她多次在日军强奸犯罪现场解救中国妇女,日日夜夜在中国妇女的哀告和求助中度过,多次目睹受害者惨不忍睹的尸体。她的努力在今天看来,是需要很大勇气和高度人道主义精神的英雄行为,但她自己当时却因为不能解决所有中国人的痛苦而产生极大的无助感,反复自责。在新旧创伤后的压力交替作用下,PTSD症状日益严重。

PTSD是一种疾病,而且在今天是可以进行心理干预和医学治疗的,已经发现下列方法在技术上有效:

- 1· 暴露治疗:帮助患者面对痛苦的记忆和感觉,疏导并缓解患者的痛苦。
- 2· 认知治疗:帮助患者找出使他们痛苦的问题实质,恢复其自信心,并帮助其康复。
- 3· 生物反馈治疗:通过传感器把所采集到的内脏器官活动信息加以处理和放大,及时转换成

人们熟悉的视觉和听觉信号,并加以显示。通过学习和训练,学会在一定范围内对内脏器官活动的随意性进行控制,矫正偏离正常范围的内脏器官活动,恢复内环境的稳态。

4· 药物治疗:多个治疗结果表明,SSRIs和SNRIs类药物治疗PTSD确实有效,老的抗抑郁剂对战争引发的PTSD可能特别有效。[36]

但在当时,人们还无法从科学层面充分意识到PTSD的危害,更遑论治疗。魏特琳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传教士,她知道自己必须克服现实带来的伤害,但她的选择是她熟悉的上帝。实际上,南京即将沦陷的1937年12月11日,魏特琳已经对宗教的作用作了定位,“今天的祈祷做得很好,宗教就是为这种时刻创造的”。[37]但她无法预计日军会把南京变成怎样的人间地狱,无助的时刻,她泣血呼唤:“噢,上帝!阻止日军凶残的兽性,安慰今天无辜被屠杀者的父母们破碎的心,保护在漫漫长夜中备受威胁的年轻妇女和姑娘吧!愿没有战争的日子早日到来!正如你在天国所为,你也一定会恩泽芸芸众生。”[38]所以,当她的助手陈先生和罗小姐从日军魔爪下侥幸逃生时,魏特琳等人特地举行了感恩会,她感动地说:“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祈祷。”[39]

但上帝不是总能回应魏特琳的祷告,“看不到未来”的她,也曾选择逃避:“我不想看南京,因为我肯定它已是一片废墟。”[40]但现实总是揪住她的视线,1937的圣诞节,她再次发自内心地祈祷上帝,当20多名妇女因为有人担保而被日军释放时,魏特琳用宽慰和感恩来辞旧迎新:“因为在苦难和悲哀中也有福佑和奇迹。”[41]

我们不能不钦佩魏特琳的仁心厚爱,作为一个PTSD患者,她把自己的解脱建立在南京市民首先获得解脱的前提之上,1938新年来临,她深情地祷告说:“上帝可怜那些穷人吧!但愿他们不要经历我们这里10天来的恐怖!”[42]她也真心地期望,能通过宗教活动,减轻那些受害者的痛苦,“因

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安慰”[43],所以,我们可以发现,1938年后魏特琳日记中记述的宗教活动日益增加。魏特琳看到了她想看到的一些个案。一个会讲英语的日军士兵妻子是基督徒,她对魏特琳讲的第一句话是:他们对南京发生的一切非常抱歉;一个长老会传教士吴(伍)小姐历经艰险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精力充沛地参加宗教活动,尽管她进城时被日军强迫脱光了衣服[44];有5个女孩转变了自己的信仰,一个女孩说,赞美诗成为她慰藉的源泉[45];参加礼拜的妇女人数有时会大幅度增加,人们的宗教热情在遭受威胁时有很大提高,等等。

但是,魏特琳无法救赎自己。她知道自己在南京不是一个普通人[46],是关系到许多南京人生命和安全的外国人,这一份沉重的责任感和面对现实时的无能为力交织在一起,煎熬着她敏感的内心。一些并非她责任的事,却让她自责不已。如,她们曾劝一个27岁的妇女离开难民营回到她丈夫身边,结果这名妇女离开后的3小时内遭到3个日军士兵的强奸。她需要上帝教给她摆脱人生苦难的智慧,但是,一边每天承受着重压,一边“还有更多我似乎根本无法完成的事……因为我的办公室总是被人们围困,他们来请求我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帮助”。[47]魏特琳的日记中,“太累”、“筋疲力尽”、“一点精神都没有”之类的言词越来越多。今天,我们知道,她正在失去战胜PTSD的机会。

魏特琳日记在医生的眼里,就是一部PTSD患者的自述史,因为篇幅的关系,我这里无法一一陈。魏特琳说:“在我记忆深处总是悲惨的画面——难民们的画面。”[48]尽管她也用各种方法试图排遣抑郁,但日军残杀无辜的报告案例、小狗莱蒂叨来的小孩头颅、遍地的尸臭、被侮辱的中国妇女的哭诉、肆虐的汉奸、外国人

士之间交流的各地惨状等等,总是在提醒她苦难的事实。在魏特琳的日记中,月光慢成为一种指标,1938年下半年以后,皎洁的月光总能引起她的悲伤。英文把精神疾病患者称为Lunatic,其词根Luna即指月亮,西方的古人揣测精神疾病是月亮引起的,魏特琳的症状与此十分巧合。关于疲劳和焦虑的记录在日记中的篇幅逐渐增加,日军每一个层面的存在总是引起她的“厌恶”。由于心情不好,脾气本来很好的她,与同事之间的争吵后来也多了起来。欧洲战争在1939年9月爆发后,魏特琳为人类遭受的无休止的战争噩梦而心头滴血,每到一个相应的日子,都会让她回忆起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种种经历。

无辜的魏特琳,更紧地拥抱上帝。尽管疲劳不堪,她主办的各种宗教学习班规模不断扩大;贝德士、马吉等传教士的布道会她热切地参加,反复体味,时时感动;她郑重地记录别人的警句:“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相信十字架的启示,相信天国,相信生命不朽,我们就知道目前的混乱不会持久”[49];她相信慕尼黑会议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这是由祈祷所致”[50];在她认为南京大屠杀最恐怖的一天1937年12月17日的一周年纪念日,她感谢上帝对她们们的保护,也为日本的领导人和基督徒祈祷[51];她频繁地引用祈祷会上那些励志性质的《圣经》语句,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等等……但是,时不时地,现实让她对宗教也倦怠了。1938年的“创始者节”,魏特琳坦承没有心情搞庆祝活动,只是“简单”地举行了祈祷。[52]沃德主教主持礼拜时,一向不喜欢夸耀自己贡献的魏特琳,对沃德“没有对我们去年冬天的勇敢的行为加以评论”,表示了不满。[53]贝德士从马德拉斯宗教会议归来,指出:现在世界上的非基督徒比过去10年中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这让魏特琳感到“黑暗”和“泄气”。[54]世界对魏特琳来说不再值得期待,她的日记出现了中断。[55]烦躁、悲哀、情绪低落、绝望,笼罩了魏特琳。而此前,高尔斯华绥[56]充满幽暗、死亡气息的诗篇《幽灵谷》已经出现在魏特琳德日记中,反映了她绝望的心境:

主啊,我已启程赴死亡之海,  
昔日阳光的欢笑难以忘怀。  
岂不浪费天生我才?  
给我最后的慰藉;  
人类从此不再战争![57]

上帝最终没有能够挽救魏特琳,1941年5月14日,她在美国选择自杀。可是,翻开魏特琳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她这样的手迹:

早线菊正在怒放,野月桂树也开着花。两种水仙刚刚开花。实验学校的树上栖息着许多鸟,垂柳不高不矮,优雅得体,一些翠鸟在长长的相互缠绕的柳枝间穿梭,真是一幅动人的景象。[58]一个在南京大屠杀高潮时也没有失去对生活热爱的魏特琳,却最终被PTSD摧垮了,她是南京大屠杀的美国籍受害者。

### 余 论

2004年11月,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的作者、美籍华人张纯如女士自杀,尽管关于她自杀原因的推测有很多,但她在写作过程中接触到的南京大屠杀的血腥历史显然是重要诱因。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在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那些照片时,“在一个眩晕的瞬间,我陡然明白生命和人类的经历都是如此脆弱”。[59]对于南京大屠杀中逝去的生命和人类尊严的感伤,对于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否认或变相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气愤,成为张纯如挥之不去的心结:

“……购物或在公园散步时,《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影像就会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并不想让这些事毁了我的余生。”[60]张纯如在致友人信中也曾如此自警,但PTSD的袭击,使她走上了魏特琳的老路,PTSD危害之烈,于此可见一斑。

初步研究表明,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PTSD是广泛存在的。从受害对象来说,不仅有那些直接承受日军暴力的人,也有哪些目睹暴行的人;从受害范围来说,不仅有南京人、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从受害时间来说,不仅是经历南京大屠杀的当时,也延续到今天。在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是当今世界必须正视的、属于全人类的历史。

注释:

[1]戴维·迈尔斯著,黄希庭等译:《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584页

[2]杨贤菊、张杨:《PTSD及其心血管反应》,《心血管病学进展》2002年第5期。

[3]王焕林等:《中国军人个性特征的调查分析》,《中华精神科杂志》1997年第3期。

[4]张本等:《唐山大地震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抽样调查研究》,《中华精神科杂志》1999年第2期。

- [5]徐维等:《特大爆炸事故幸存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初步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年第9期。
- [6]马磊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遗传易感性研究》,《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4年第1期。
- [7]张克让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及一线医务人员和疫区公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对照研究》,《中国临床康复》2005年第12期。
- [8]程灵芝等:《急性应激干预的原则和方法》,《中国临床康复》2003年第3期。
- [9]黄静等:《地震灾区青少年伤员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心理、药物干预》,《中国医药指南》2008年第10期。
- [10]王瑶等:《强奸受害者中的女性心理与行为问题综述》,《社会心理科学》2007年Z3期。
- [11]杨晓云等:《大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特点及教育的启示》,《教育科学》2007年第2期。
- [12]戴维·迈尔斯著,黄希庭等译:《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584页。
- [13]拉贝日记,1938年2月3日。[德]拉贝著,刘海宁等译:《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467页。
- [14]《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15日),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
- [15]蒋公?:《陷京三月记》,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 [16]《罗森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1月15日),第327页。
- [17]郭歧:《陷都血泪录(节录)》,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第167—168页。
- [18]拉贝日记,1937年12月28日。[德]拉贝著:《拉贝日记》,第240页。
- [19]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17日。张连红、杨夏鸣、王卫星等编译:《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154页。
- [20]《黄学文口述》(2006年6月26日),调查者:邱伟、胡凌、孙香梅。张生等编:《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下),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版,第1369页。
- [21]拉贝日记,1937年12月15日。[德]拉贝著:《拉贝日记》,第151页。
- [22]拉贝日记,1938年1月25日。[德]拉贝著:《拉贝日记》,第417页。
- [23]拉贝日记,1938年2月6日。[德]拉贝著:《拉贝日记》,第488页。
- [24]戴维·迈尔斯著,黄希庭等译:《心理学》,第585页。
- [25]程瑞芳日记,1938年1月2日。张连红编:《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第27页。
- [26]《关于菲奇就南京事件进行的巡回演讲》,张生等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88页。
- [27]《寄往德国驻华大使馆(汉口)的报告》(1937年12月30日),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294页。
- [28]威尔逊日记,1937年12月19日。章开沅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页。
- [29]《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1938年2月23日于汉口),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第405页。
- [30]《暴敌兽行世界彰闻英报揭露敌兵狰狞面目》,汉口《大公报》1938年3月28日。
- [31][http://www.china.com.cn/law/txt/2007-11/23/content\\_9312760.htm](http://www.china.com.cn/law/txt/2007-11/23/content_9312760.htm)
- [32]马吉:《致妻子函》(1937年12月12日—1938年2月5日),章开沅等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第160—161页。
- [33]《关于影片〈南京暴行纪实〉的引言和解说词》,章开沅等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第190页。
- [34]即金陵大学校长美国传教士文怀恩,他在乱兵抢劫财物时被杀。
- [35]魏特琳日记,1938年3月24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248页。
- [36]杨贤菊、张杨:《PTSD及其心血管反应》,《心血管病学进展》2002年第5期。
- [37]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11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144页。
- [38]魏特琳日记,1937年12月16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151页。

- [39]魏特琳日记, 1937年12月17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154页。
- [40]魏特琳日记, 1937年12月21日、24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158、161页。
- [41]魏特琳日记, 1937年12月31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168页。
- [42]魏特琳日记, 1938年1月7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176页。
- [43]魏特琳日记, 1938年1月19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192页。
- [44]魏特琳日记, 1938年1月22日、23日, 1939年12月5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195、197、537页。
- [45]魏特琳日记, 1938年10月16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363页。
- [46]魏特琳日记, 1938年3月30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255页。
- [47]魏特琳日记, 1938年4月12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265页。
- [48]魏特琳日记, 1938年6月24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322页。
- [49]魏特琳日记, 1938年9月11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338页。
- [50]魏特琳日记, 1938年10月2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352页。
- [51]魏特琳日记, 1938年12月17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407页。
- [52]魏特琳日记, 1938年11月13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384页。
- [53]魏特琳日记, 1938年11月20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390页。
- [54]魏特琳日记, 1939年3月9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449页。
- [55]魏特琳日记1940年3月3日至3月21日中缺,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572页。
- [56]英国诗人, 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57]魏特琳日记, 1939年11月11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528页。
- [58]魏特琳日记, 1938年3月29日。张连红等编译:《魏特琳日记》,第254页。
- [59]张纯如著,孙英春等译:《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 [60]<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7/11-23/1085900.shtml>

(原文转载于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编辑:秦利明)